



余秋雨，1946年生，艺术理论家 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原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曾赴海内外多所大学及文化机构讲学。理论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

1999年7月11日，余秋雨先生走上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坛，发表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并回答听众及网上观众提问，湖南经济电视台及其网站同时直播了这次演讲。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人

——余秋雨岳麓书院演讲笔录

陈孔国 江堤整理

诸位朋友：下午好！

我没有料到今天的场面会如此奇特又如此感人，下雨，大家穿着雨衣，带着伞，在这个千年学府里边聚会。至于这个聚会的题目，我偶尔在电视里面看到，叫“余秋雨设坛千年学府”，我想这是现在名震全国的湖南电视艺术家的一种浪漫的提法，就我个人，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说，大家都很清楚，那是很难消受得了的。我正在完成一个作品的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突然想起我应该到长沙来，因为我好多年一直担任湘财证券的文化顾问，我想到这里来找安静的地方，来了以后就遇到这样的一个聚会，我心里是很高兴。但是，我想大家无论是听的还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的朋友，这一点要明白，我面对这个千年庭院，面对着千年前的大师，绝对没有一点点傲慢，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绪。但为什么来呢？我想说这么一种心态：今年是1999年，正好800年前，也就是1199年，我们中国可以称得上世界级的哲学大师朱熹先生去世了。不管哪一种理由在他去世800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学人应该到这儿来朝拜他，来纪念他。

朝拜千年庭院

我在《千年庭院》那篇文章里边提到，就在他去世前两年，他已经很难在岳麓书院里呆下去了，因为他在这儿发表的演说已经成为朝廷所不容许的所谓的逆说，后来成为“逆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赶走了。在赶走的时候，岳麓书院的学生跟着他。由于迫害越来越深，最后，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感人的告别晚会。他的一个最好的学生叫蔡元定，明天就要被捕，而且要流放千里，理由是，他是朱熹学说的信徒。朱熹召集了自己所有的学生，来为自己这位好学生送别。那天晚上，他提出，我年纪已经很老了，有没有可能今天就和我住在一起话别。但是当宴会结束以后，他们那天晚上话别，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一同在校订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叫《参同契》，一直到东方发白，然后老师就看着学生被捕，最后这个学生死在半道上。

这个从岳麓书院出发的让人很感动的有关老师和学生的故事，我想一定可以感动很多很多后人。就凭着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记忆，我们在 800年以后，来朝拜大师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从我的内心讲，“设坛千年庭院”，把它变成叫“朝拜千年庭院”更合适一点。主语不是我，不是“余秋雨设坛千年庭院”，应该是众学子朝拜千年庭院。我相信在今天这个下午，这个场合，就合适了，大家坐在这儿也心安理得了（掌声）。

中华文化的悲剧性命运

我们一同在朝拜。我等于是在这个朝拜仪式当中开个头。之所以我来开头，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是，我好像写过一篇有关他的文章，那么我等于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再延续一下。感谢湖南的朋友对我的信任，让我来主持这个朝拜仪式。我在想，80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来到这座庭院，我们该向朱熹先生他们说点什么？中华文化在他们离开以后的那些年月，到底有什么样的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将如何把文化的高贵继承下去？不要辱没他们的名字，包括不要辱没这样的庭院。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我在想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朱熹先生离开800年之后，我们中华文化的命运，真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很难用一个短暂的时间能够把这800年中华文化的经历说清楚。但是有最粗浅的几点那是可以说的。我曾经在文章当中提到，在朱熹先生离开的300年之后，另一位世界级的哲学大师，就是我家乡的王阳明先生来到这个庭院。他在这儿徘徊，他的思维和朱熹先生距离比较大。但是，他在这个庭院里面徘徊的时候，他感慨良深，他写下了一些非常深情的诗句。那是300年以后。后来，又过了几百年，非常巧，我们中国历史的纪年也进入到和世界同步，就是以世纪作为一个分隔的阶段。大家知道，中国历来是以朝代作为分隔阶段，但是朝代的时间参差不齐，所以就像时间有节奏，历史有季节一样，我们按照正常的方式，以百年为序就成了非常有趣的分隔点了。如果说，朱熹先生去世在12世纪的最后一年，这个有点巧合的话，那

后面这样的巧合就比较多了。比如，我们就康、雍、乾盛世的结束，乾隆皇帝去世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又结束了一个时代。19世纪开始，中华文化突然遇到了和西方文化的冲撞，中华文化过去的骄傲和自己带来的许多弊病，在19世纪的冲撞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总的说来，这种冲撞对我们中华文化来说是悲剧性的冲撞，更多地暴露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某一种不适宜的地方。但是，它的骄傲的一面没有很好地冲撞出来。所以在19世纪晚些年的时候，有一大批文化人，包括当时在岳麓书院出发的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在思考中国的命运，他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考虑要改变19世纪对中华文化的一个根本意义上的曲解。所以20世纪就成了要雪耻的这么一个世纪。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了很多很多事件。当20世纪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来看待一代一代大师留给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现状和我们的前景。这就是留给我们的课题了。

中华文化在世纪交替时期怎么走

岳麓书院在思考，到处我想都在思考。很有趣的是，当年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教书的人，想也想不到的一些遥远的地方也在思考着，中华文化在历史转型时期，在世纪交替时期它怎么走？我想起去年在东南亚一个地方进行了一次叫做“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来听。有四个主讲者，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我想大家知道，提出“文化中国”概念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另外一个是在威士康辛大学的高希均教授，他曾经提出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

餐”这个著名论断^①；还有一个是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叫陈瑞献先生；对话当中特别没有资格的就是我——四个人当中。我们四个人在那儿进行了一个叫做“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来的人都是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化的子民。在那个对话当中，大家发表的观点各种各样。我当时谈论的问题，我也很想在岳麓书院里边，向这个古老的庭院、向我们在座的诸位作一个简单的汇报，然后我再引伸我的思想。

我想告诉我们的文化先辈，尽管中华文化的命运后来是坎坷曲折，但是中华文化的传播，在他们的身后还是相当的广阔，传播开来了。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有关中华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很悲壮，有的甚至让人听了以后极其心酸，但是这个故事天天在发生，传播天天在扩大它的领域。但是，传播的范围越大，遇到的问题也就越多。中华文化到21世纪它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新的世界规模当中，它以什么形象出现？

中国人的尊严最终应该由文化来给予

我们知道 我们的经济可以使我们强大 我们知道 我们各方面的社会发展，可以使我们表现这个民族表现得很精采。但是有关中国人的尊严最终应该由文化来给予。而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究竟如何？这是我们不断要思考的问题。

我在那儿发表演讲的题目，我看网站上传过来的消息，

^①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系美国经济学家希尔顿弗里曼(Hilton Freeman)提出来的，原文为“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好多朋友都看到了，我当时发表演说的题目叫《第四座桥》。
我想作一个整体的回顾。

中华文化交流的三座桥

我在想，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的世界形象，我可以说不
已经搭建了三座桥。

第一座桥，在我看来叫“经典学理之桥”。这指的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好多经典，在世界上确实确实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包括朱熹先生的学说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应该说大概在17世纪的时候，来了很多西方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想来传播他们的宗教，但是当他们在中国住下来以后，突然发现我们的先秦哲学当中有一些思想让他们非常震撼，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种反向传播。一方面传播他们的宗教，一方面把他们所发现的中国的先秦哲学传播回去。他们翻译了比如孔子、孟子的一些书，甚至写了《孔子传》。这些翻译使西方世界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哲学而惊叹，深深地惊叹。他们认真地读。在我看来，比如像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当中很少有人没有读过由17世纪的那些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他们都受影响，评价不一样，但是影响都很深。比如据我发现像孟德斯鸠，他的评价是从中国的古代哲学里边，他发现了某一种专制的阴影。其他人就没有这样一种负面评价，但是组合在一起就说明他们已经比较了解了。这些对中国古典学理的传播桥梁，那个时候搭建，现在也没有瘫掉。可以这么说，哪怕是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他如果要写一本世界哲学史的话，那么他就会把前

面好长的篇幅留给中国古代哲学。这是第一座桥，叫古典学理之桥。它搭建了，而且现在它巍然屹立。

第二座桥，我称之为“世俗民艺之桥”。这指的是什么呢？随着我们许许多多华人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来到美洲、甚至来到欧洲。他们带去了自己的日常文化生态方式。这当然也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经典学理之桥是高高在上的一种能够表达出我们文化尊严的高层建筑的话，那么世俗民艺之桥却把具有质感的我们的文化实践状态推到了世界各地。我们如果到世界各地走走的话，我们会看到舞龙、舞狮、龙舟、功夫，甚至包括餐饮，等等等等，民间艺术以那种世俗方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看到漂洋过海的华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某一种文化生态的话，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感到很亲切。但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也感到一种遗憾，就是有相当多的西方文化人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华文化的主要部位。他们甚至于对我所熟悉的戏剧艺术也往往作世俗民艺方面的理解，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民间艺术，带有技巧性的民间艺术。这时候，就觉得，是啊，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父母辈的文化生态，但是中华文化的最精华的部位好像不在这儿。你没法跟世界说清楚，你最精华的部位在哪里。但是你感到，这是的，但是又不全是，不仅不全是，主要部位还不在这儿。这是第二座桥。这座桥，现在你到世界各地还能看到，很热闹，一到有节日的时候，在唐人街里边，在好多华人社区，那种文化生态方式，比我们的腹地大陆还要热闹还要纯粹。这是文化，但是我们总觉得，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座桥，信息传媒之桥。这指的是，从耶稣会的传教士当时写回去的信，这些信终于慢慢地被出版了。然后有好多游记，有好多日记，有好多调查报告，到现在有好多摄影集，有好多纪录片，现在当然传播更方便了，有电视、有网络，有很多很多的传媒方式，通到世界各地。我们中国的文化生活和熏陶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太陌生了。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更多地也往往是以信息的方式来接受，看到了哪一个时代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已经搭建了这三座桥，我再重新讲一遍，古典学理之桥、世俗民艺之桥、信息传媒之桥。那好像已经很完整了，有那么三座桥还不够吗？我说不，好像似乎还缺一座桥，所以我的演讲题目叫“第四座桥”。

搭建文化交流的第四座桥

这个第四座桥是个什么样的桥呢？我们先不给它作论定，我只是说那么一个非常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大诗人歌德，他对中华的古典哲学非常感兴趣，他有一段时间在魏玛做官的时候，他有外号——人家叫他“魏玛的中国人”，甚至于干脆叫他“魏玛的孔夫子”。可见他成天在讲中国古代哲学，才会有这个外号。有人还说他可能学过中文。他的中文学到什么程度呢？完全不知道了。但是，有一天，他非常偶然地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传奇作品，看了以后，就把自己的秘书埃克曼找来，我记住好象是 1827 年 1 月份的一个晚上。他告诉埃克曼：不得了，我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作品，我突然发现中国人在好多方面和我们几乎是一样，但是当然也有好

多方面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爱，他们的情感判断，他们的有关人和人之间交往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完全能理解。但是，他们看到月亮会想到什么？看到风会想到什么？这个感觉呢又和我们不太一样。就在那一天，他在谈论他看到了中国的一个文学作品的时候，他提出了到现在为止全世界都在认真学习的一个概念，就是世界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概念。研究比较文学的朋友们大概不会淡忘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是我们研究比较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坐标。

那么我们在问歌德如此地了解我们中国古代学理为什么看到一个小小的中国文学作品，就会如此地感动，如此地激情洋溢地发表了这么一番话呢？而且我们现在大体知道，他所看到的那个作品好像是《风月好俦传》，在中国的文学地位上并不高的一个作品。说明一点，就是当我们古代哲学传过去以后，当我们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传过去以后，当我们作为一种信息报道传过去以后，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表现中国人的灵魂的一种东西，包括他们精神内涵的东西，还没有很好地传播过去。这个属于艺术范围。就像德国有了歌德、有了贝多芬，人们要通过歌德和贝多芬来了解德国人，人们要通过雨果、罗丹来了解法国人，人们要通过泰戈尔来了解印度人，或者通过海明威来了解美国人一样，我们中华文化经过好多世纪以后，还没有一种强有力的、足够的、能够体现群体灵魂的那种艺术吸引力，让我们文化圈外的世界人们所共同感动。

我们说，我们有过一些古典小说、古典作品，我们有过一些很好的诗词，他们不感动吗？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由

于我们的中华文化太强大了，这种自足的方式还没有能够从真正的意义上来感动我们这个文化圈外的人。深层意义上的感动还没有。我们那么喜欢的唐诗，但是，它的主要研究者，我们只知道，可能是在日本、在韩国，在一个边缘文化圈范围之内。我们所说的某一些中华文化当中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些话本小说，至少在全世界的影响不像我们有一些著作当中介绍的那么强烈，并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就遇到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就是作为活生生的中国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群体灵魂的呈现方式，还需要有更多的作品以更堂皇的方式呈现出来，让这个地球上其他方位的人真正地明白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灵魂深处真正明白，而不是在外在的情况下来判断。既不是凭着古典学理来看一种风干的形态，也不是从一种热闹的民俗民艺来看一种生态呈现方式，这都是比较遥远地来观看，或者说比较外层地来观看。深入人心的一种观察方式还没有。大家说，我们干嘛要在乎人家，我们自己活得好就可以了。那么，这一点我想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大家明白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按照我的说法，我们当然可以不看人家的脸色，但是我们应该让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在我们的手上或者我们下一代的手上，去感动其他文化属群。中华文化有这个资格，中华文化有这个权利。但是多年的兵荒马乱，多年的好多很不幸的历史过程，使中华文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堂皇地取得这个资格、这个权利，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努力要来搭建的第四座桥。

震撼灵魂的作品还没有出现

我们是从一个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纯粹从批判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搭建这座桥。在这个搭建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想我们如何进一步来塑造我们自己新的素质，我们进一步地来反思我们曾经有过的缺陷，我们进一步地来改变我们的好多已经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态方式。我们想有没有可能把问题想得大一点，想得高一点。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深深地反思一下的话——我们尽管非常尊重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家、前辈的作家，他们作了很多很多努力，我们可以开出一大串的名单，说明他们曾经在搭建这座桥梁当中作出很大很大的贡献，但是这座桥梁似乎至今还没有很好地畅通，如果畅通，也显得不够坚实的话，那么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到21世纪我们却不能如此了。我们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在谈论的时候，已经不是一种过于轻松的谈论了，我们已经感觉到某一种紧迫感。如果当世界已经非常瞩目地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时候，他们还很难收到有关我们群体灵魂的最美丽的的信号的话，中国的艺术家要感到责任。我们过去是不是过于具体，过于琐碎地来思考我们手上的许许多多实用性或者实利性的追求，我们缺少一些整体关注，我们缺少一种宏观的思维，我们缺少一种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整体关怀。我们表现出我们的愤怒，表现出我们的批判，这都需要。但是作为一个真正能够感动很大范围，包括感动我们后代的作品，它似乎还需要有一种更彻底的追求。我们的文

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会停留在技术性的层面上，我们的绘画会停留在笔墨趣味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作品都会停留在一些表述的程序上。我们很长时间内，都不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到绝境当中经受一种考验，然后发出有关生存状态最壮丽的呼号，这很少，这确实特别少。

点燃文化之火

我们在面对我们传统的时候，常常分不清作为一个后代学子应该有的积极态度，或者我们过于狂妄，或者我们又过于地拘谨。我们就把祖先留下的许许多多东西一层一层地都压在我们自己的肩上，而很少去触摸它真正有价值的灵魂。我们面对传统，往往就缺少这样一种勇气，缺少这样的一个魄力。就像黑格尔所讲的一样：历史是一堆灰烬。我们要把手伸进这堆灰烬里面，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余温，我们要捕捉的是这个余温。把这个余温和我们的体温联结起来，然后有可能点燃很多很多读者心头的文化之火，这个我们做得不多。我们就觉得这堆灰烬最重要，灰烬就是重要，灰烬全部都是重要的。很少把手伸进去，去动弹一下灰烬的外层，就已经有好多人去责备你了，往往是这样，这就出不了很好的作品。过于固步自封，过于人云亦云，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自己生命的热能焕发不出来，我们祖先传教给我们的生命热能也就耗散掉了。我们不可能在新的时代上好好地创新，创新出我们的祖先希望的但又了解的东西。

让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能够很好很好地延续下去，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愧疚总是很深，我们的遗憾总是很多。就

包括像我自己这样的人，我面对世纪之交，我就想，就像我这个人素质当中具有太多太多的障碍，具有太多太多不合时宜的地方。我有的时候会思考到文化的一些宏观的东西，一些道义性的根本的东西，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伴们对中华文化问题的思考，往往是技术性的、具体的、琐碎的，往往是这样，使文化失去了它的最庄严的本源。比如我自己写文章经常有这个感觉，写了一点散文，人家引起了一些好评，或者写了一些学术著作，得到了一些奖励，就会顺着这些好评顺着这个奖励一步步走下去了，以为这就是我这个文化追求的某一种终点性意义了，我只是在这个终点性意义周围徘徊徘徊就够了。而没有想到，我这个生命，是一定要在我们人生的短暂过程当中，接受最严重的磨砺。在这个磨砺当中，把人之谓人、中国人之谓中国人的那种最珍贵的东西揭发出来，这就很少很少。所以，当有一个很好的批评家批评我的作品严重地缺少酒神精神，最多只有日神精神的时候，我当时虽然是一身冷汗，但是觉得非常痛快。我觉得真是深深地了解我的局限，就是完全不能进行很好的大规模创造的任务了。这一点，在这样的庭院里边，面对我们的祖先说的时侯，我觉得非常地惭愧，但是也觉得需要这么说。

等待建“桥”者

那么，当21世纪的任务放在我们眼前，无论是我，无论是我的同仁者，我们都应该感到，就我们来说，我们浪费掉的时间太多太多，我们的很多岁月都在过去的慌忙的一个过

程当中耗散掉了。所以，由我们参与搭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这是时间原因，你的生命过程的原因，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 21 世纪的新的一代人的身上。但是我们这一代需要呼吁，我们这一代需要有这个眼光来指点，需要这样，而不要再沉淀在我们文化界一些非常琐碎的一些事务性的麻烦当中，需要来指引。

那么 21 世纪在中华文化能够搭建起的桥梁当中，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一个心态就是一定要大力地欢呼——欢呼不到的时候——期待那些建设者，不要出现过去曾经有过的情况，就是拆桥的人比搭桥的人还要多得多的情形，这个桥就很难搭起来。一定要搭这个文化之桥，一定要慢慢地呼唤建设者，或者等待建设者的心态。有人曾经问，你老是用等待来表现一种中国艺术文化的一种期待，是不是有点消极。我说，等待不是消极，等待其实对艺术文化来说是提出一种很高的坐标。为什么很多船很多船都过去了，你都认为它不是，你还在等待下一条船呢？就是你有坐标，等待表现出一种坐标，成为一种严格的要求。就像中国古代的诗人曾经写一个妇女，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回来的江边的窗上看着，这条船不是，那条船不是，过尽千帆皆不是，一条条都不是。等待表现出一种否定，等待表现出一种对质量的呼唤。我们热烈地欢迎建设者，同时等待着好作品的出现。等待者实际上也是高贵的一群。

千年庭院里的历史性判断： 公元 2020 年中华文化将广泛复兴

我们不断地参与，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建设，最后会出现什么情景呢？我估计，我们在这个千年庭院里可以做一些历史性的判断。就是在大概 2020 年左右，也就是说在 21 世纪开始的 20 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化可以出现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复兴。这个话，我虽然说是我的估计，其实是有很多人提出了同样的判断。

大家可能看到，我在《山居笔记》的序言里讲到了白先勇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当中的判断。他认为在 2020 年中华文化可以出现世界性的复兴。因为，很多很多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而如果不在那个时候复兴，复兴的最佳时机有可能失落。所以，经过层层叠叠地判断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先勇先生他不仅是作家，也是学者，他也不是个人的判断，代表了一大群海外的高层的华人学者的集体意识。我前不久在国内见到他，他同样地表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我非常赞同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在 2020 年左右中华文化有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大的复兴。

文化整体性尊严

这次复兴会给我们的祖先，会给我们全体中国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尊严。这是这些年来我始终在考虑的问题，因为我走遍世界很多地方，我总觉得海外的很多文化群落，